

刘小萌 著

满族的部落与国家

吉林文史出版社



满族的部落与国家

刘小萌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07号

Manzu De Buluo Yu Guojia
满族的部落与国家

刘小萌 著

责任编辑: 王桂兰

封面设计: 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375印张	28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册	定价: 14.00元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ISBN 7—80626—037—4/K·31		

序

王钟翰

刘君小萌撰著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致力于对清入关前满族先世女真人的历史研究，大量搜集满、汉文文献档案资料，尽可能地吸收国内外一切有关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综合分析和概括，不囿成说，卓有创见，不失为目前满族开国史研究中最集中、有系统、而又全面深入，具有较高水平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约25—6万字，现由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推介，交吉林文史出版社慨然准予出版，即将公诸于世。顷刘君以原稿全部相示，并嘱序之。以有师生谊，我何敢辞？

刘君小萌，河北完县人。80年代初，从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我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满族史硕士研究生，同学于我。刘君熟练掌握俄文与满文，兼通日文。勤于学，敏于思，每有所疑，辄不耻下问。三载朝夕相处，质疑问难为多，我则深感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之为乐事也。80年代中，刘君以优异成绩毕业前夕，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编纂组需一兼通满文的清史研究人员，遂推荐刘君，刘君欣然往。先为著名蒙元史专家蔡美彪教授助手有年，继而考取蔡教授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三年学习期间，蔡教授亲为讲授各课。私庆刘君能得侍蔡教授讲席，学业猛进，名师出高徒，蔡教授不患传之无其人矣。

多年来刘君与我城郊分处，而刘君不以交通为阻，时相

过从，偶亦出示所作，令我先睹为快，即或妄加点窜，不待不肖见怪，颇引为知赏而持去。80年代末，刘君行将博士生毕业，蔡教授原约我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会，适我有远行，未克如命以往。但刘君长达12—3万字《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毕业论文的打印稿，仍以一份相贻。我粗略翻阅过，益足征在蔡教授精心指导下撰成的毕业论文，洵是一篇出色的不可多见的博士论文。今兹《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即在上述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穷二、三年之力，修改增订而成，字增一倍以上。两相比较，尤可见蔡教授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奖掖后进，敦促有方；刘君用力之勤奋，思考之周密，访罗之丰富，取舍之精审，行文之快速，与蔡师相得益彰。值兹两个文明建设并重之际，刘君能取得这一新研究成果，不可谓非难能可贵的后起之秀了。

刘君这一新研究成果，其最大优点在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以满族本身史料来论证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局限于清朝奠基人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50年间的历史进程。这是因为：一则从时间上追本溯源，从13世纪上半元末明初之际开始，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半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崇德年间，前后历时300余年之久；再则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除探讨以建州三卫和海西部为核心的满族共同体外，扩充到居住在整个东北地区，凡与满族有一定血缘关系以及和历史传统文化渊源有关的通古斯语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各民族，甚至再推而广之，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回纥、蒙古、朝鲜各民族在内的相互关系，其中尤以满族共同体受蒙古族各方面的影响为多。本书中所谓“比较先进的蒙古制度，曾是努尔哈齐建国过程中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者即是。而且刘君进而

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经济、政治、法令、婚嫁、生产诸方面，一一加以对勘，说明满族先民受比邻各先进民族，特别是受蒙古族的遗风旧俗的深刻影响，解决了不少前人所未涉及或未完全解决的疑难问题，从而将清入关前满族开国史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刘君好学敏求，不自满假，于书末慎重申之云：“满族的国家形成，显然属于‘受外部的影响’那一类。关于满族先民与明代以前女真人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刘君年方不惑，治学态度即谨慎如此，有足多者。是为序。

1992年2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前 言

满族是继蒙古族以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清代近三百年统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研究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是满族史的重要课题。满族建立起的清朝，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大量遗产，但是又带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如果不联系满族的早期历史，往往难以说明。清初满族正处在社会制度迅速变革的阶段，但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的某些落后性，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又曾一度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满族的早期历史，对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满族史、清史学界发表了不少有关明代女真和清入关前满族历史的论文论著，大多偏重某一专题的研究，如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元末以迄明季三百余年间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系统的说明，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工作。由于满族的历史特点和资料隐讳缺略，本书研究的课题难度较大，专门性很强，笔者为从事这项工作，以较大的功力作了理论准备，并广泛利用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资料和满文文献，参考了前人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满族先民的明代女真，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自身历史的文字史料，考察这段历史主要依据当时外部明朝、朝鲜的一些

记载，以及后来清朝满族统治者对祖先业绩的追溯。

朝鲜长期与女真民族为邻，历史关系悠久。明代的朝鲜，由于国力比较单薄，对东北境骠悍的女真部落不能不持有强烈戒心，比起以泱泱大国自居而目空一切的明朝来，显然更关注女真社会的动向。因此，在研究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料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朝鲜李朝实录》

（简称《朝鲜实录》），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李朝建立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与中国明清两代相终始。《朝鲜实录》大量记述明代女真在东北和朝鲜沿境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与报告，是我们明朝官私史籍中绝少看见的。《朝鲜实录》卷帙浩繁，全阅不易，日本学者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摘抄女真（满）、蒙古史料，直到1954年《满蒙史料》才陆续出版，至1959年共15册全部出齐。这部史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各种版本认真校勘，并编有人名地名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吴晗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全书三编，上编收明代女真史料。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和李民寅《建州闻见录》是考知满族兴起之际社会状况的两部珍藏，以往流传甚稀。1939年日本稻叶岩吉将《建州纪程图记》收入所著《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使珍本得以传布。1978年至79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将两书收入《清初史料丛刊》印行，国内学者称便。

明代汉文史料首推《明朝实录》，其中系统记录了明朝与女真诸部交往、战和的历史，有关卫所设置、贡敕制度的资料尤为翔实，但殊少对女真社会内部状况的披露，而先进

民族对落后民族的歧视，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隔膜更触目可见。1940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共500册，今以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王崇武、黄彰健等人的校勘本为佳。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从三十年代初着手《明朝实录》的校勘整理，从中辑出有关满蒙史料，1954年至59年全部出齐共18册，内《满洲篇》8册，大大节省了读者翻检之劳。

《明会典》是汇录明朝一代典章制度的书，始修于弘治年间，目前通行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的重修本，其中涉及女真卫所制度、朝贡回赏等内容均分门部类，便于考索。

《辽东志》《全辽志》是有关明代东北的两部志书，前书为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本，后书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实即《辽东志》第三次修定本，所载辽东马市、陆路交通、女真诸部风俗习惯的资料弥足珍贵，金毓黻将两志收入《辽海丛书》，并进行了认真校勘。《皇明经世文编》是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一部明人文集汇编，所收奏疏记述了不少明代女真与满族肇兴时期的史事，可补正史缺文，1962年中华书局据明刊本影印。此外，明季记女真（满族）史事的私家笔记很多，多非身历其境之作，故道听途说，陈陈相因者不少。价值较高的有，程开祜辑《筹辽硕画》46卷，收录万历、泰昌、天启朝内外臣僚关于辽事的奏疏，保留了有关满族建国前后的若干珍贵史料；冯瑗《开原图说》2卷，记海西女真史事翔实可靠；瞿九思《万历武功录》14卷，第11卷专门记述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各部行迹，及其与明朝、蒙古关系；茅瑞徵撰《东夷考略》，作者历官兵部职方主事、郎中，素悉女真状况，所述非漫然命笔。

清代满汉文献是本书利用的又一大宗史料。清朝官书往往抹杀早期历史实情，对与明朝、朝鲜的关系忌讳最甚。清

修《明史》对女真史实殊少记述，或者语焉不详。乾隆年间官修《满洲源流考》，将满洲世系上溯先秦肃慎，于明代女真活动反竭力遮掩，无此通病的仅《满文老档》。《满文老档》指满族入关前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官方史书，乾隆年间复用新满文重抄，原本残缺，今存天命前九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部分，是研究满族兴起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1918年，满族学者金梁延聘人员翻译老档，1929年将部分译稿以《满洲老档秘录》名义刊布，其后又将部分译稿在《故宫周刊》连载，题称《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译文只求达雅，信则不足，为后人所病，其实首事之功不可泯没，可惜此后数十年间老档在国内几无人问津。1939年，日本出版了藤冈胜二的《满文老档》日译本。五十年代，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至1969年7册出齐，用罗马字母转写满文，下附日文，逐词直译，是日本学者整理《满文老档》的一项突出成绩。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开始译注《满文老档》原本，即无圈点老满文原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以后以《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为名出版了两册，体例与《满文老档》日译本类同，满汉对照，下附汉语译文。《原档》所记有为《老档》不载者，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张葳《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2册，将天聪元年（1627）至五年（1631）的老档原本译成汉文，酌加注释，是台湾学者在整理研究老档方面取得的又一进展。1990年，中华书局终于印行了由国内学者集体译注的《满文老档》两巨册，是国内满族史、清史学界的一桩大事。这部译注纠正了前人译本的一些缺失，反映了《老档》翻译的新水平。但由于未录满文原文，加之个别地方抄写有误，所以在依据

满文审音勘同、考证名物等方面，尚未克超过日译本，而日译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整理翻译出版清初满文档案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无异于《满文老档》的补编。这样，关于满族建国初期的历史，便有了由满文档案和清朝实录并行的两套史料，两者可以互为参稽补充。另外，台湾学者李光涛自1959年以来先后编辑《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初集包括《沈阳旧档》38件，二集收录老满文档案4件，均为研究满族开国史的珍藏。

《满文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对于这之前的满族历史只有求诸《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前书体例为历朝正史所无：以满蒙汉三体对照行文，又附图绘数十帧。是书虽最后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但文字主要取材满文老档，图绘则源于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太祖实录图》，故保留了比较古朴的面貌，堪称研究满族早期社会制度、族源世系、肇兴事迹的瑰宝。1938年，今西春秋出版了《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将满文转写为罗马字母，用日文逐词直译，下附汉文原文，书末《注释》对书中涉及的主要制度或史事逐条铨释，抉微阐幽，是一部集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著作。近年，台湾学者陈捷先撰《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第一集），对《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的沿革进行了穷源竟委的考辨。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确立“首崇满洲”原则，重视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等一批官修史籍应运而生。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书成于乾隆九年（1744），满汉两种文本，据明清档案家乘笔记等写成，是探明满族早期血缘组织形态变迁与牛录固山制度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1989年，辽沈书社据武英殿本影印，附有姓氏人名索引。《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1739）书成，专记八旗制度与八旗人物。其中，《旗分志》和传记部分是考镜满族早期人物与牛录源流的重要凭依，历来为史家所重，今通行北京民族文化宫1983年复印本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校勘本。神田信夫曾将《八旗通志初集》和《二集》中列传和人物志所收入物编为索引，1965年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以《八旗通志列传索引》为名印行，是研究满族历史和八旗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清朝开国方略》、《清朝通志·氏族略》、《清史列传》等官修史书，也较有参考价值。

以上缕述了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重要典籍和整理情况，前人在文献整理校勘译注等方面付出的巨大劳动还远不止这些。对于文献的整理，奠定了研究的坚实基础，经过中外史家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在满族早期社会历史这一传统领域，早已成果累累。

日本学者自本世纪初即着手满族史料的搜检，对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开拓早、用力勤，成绩斐然。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三十年代稻叶岩吉撰写《清朝全史》《满洲发达史》，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这一研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高潮，涌现出鸳渊一、和田清、户田茂喜、旗田巍、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中山八郎、园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等一批知名学者。以后，他们的研究大多结集出版，主要有：周藤吉之《清代满洲土地政策研究》（1944年）、园田一龟《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1948

年)、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 1955年)、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1965年)、安部健夫《清朝史的研究》(1971年)等。五十年代以来, 日本的研究队伍仍具备很雄厚的实力, 又出现阿南惟敬这样以研究八旗制度称名的专家。

日本学者有关满族早期历史的论著论文很多, 这里仅就与本课题关系最密切的制度史研究成果作一概括的回顾。

明代女真的部落组织, 内部又包括血缘组织与地域组织, 关系比较复杂。1935年, 旗田巍发表《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¹⁾, 依据十五世纪中叶《朝鲜实录》有关图门江流域女真部落的调查报告, 对建州女真吾都里(斡朵里)部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精细考证, 认为其村落已非血缘集团, 而且贫富差别相当明显, 据此得出吾都里部氏族制度已经崩溃的结论, 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成果。三田村泰助在陆续发表的《满珠国成立过程的考察》(1936年)、《明末清初的满洲氏族及其源流》(1960年)、《穆昆塔坦制的研究》(1967年)等文中贯彻了一个基本观点: 由于女真的老氏族组织过于庞大, 不能再履行各项社会职能, 于是从哈拉分化出的穆昆逐渐取而代之, 后者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血缘组织, 是决定女真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三田村泰助祖述内藤虎次郎, 持明代女真社会氏族制度说, 故不免忽略氏族组织日呈瓦解的种种征兆, 尽管如此, 他的论著无疑构成对女真社会组织最为系统深入的考察, 不少观点颇有见地。

噶棚(即村寨)是女真部落内的基本地域组织。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最先剖析噶棚的内部结构。他在《关

(1) 凡收入本书《主要引用文献》的论著, 其出处在此不再注明, 以省繁文。

于满洲八旗成立过程的考察》(1940年)中,进一步研究噶棚的规模,探明了噶棚规模狭小的特点,认为“噶棚、乌克孙(以及穆昆)是满洲早先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1944年,《史渊》32期发表了江岛寿雄的《明末清初噶棚的各种形态》,依据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的记述,将建州女真的噶棚分为四种类型,但未就噶棚的性质和内部关系作较为详晰的说明。这种根据观察得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把噶棚组织加以分类的方法,有助于对不同类型噶棚的特征进行概括并彼此进行比较。此外,中山八郎《明末女直和八旗体制的素描》(1936年),今西春秋《满和对译满洲实录》(1938年)的《注释》,鹭渊一、户田茂喜《诸申的考察》(1939年)等文,也曾就女真社会的血缘、地域组织问题各抒己见。

女真社会组织的细胞是家庭。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分析家庭中贫富分化现象,而且揭示了家庭制度的特点。内藤虎次郎曾在《史林》7卷1号发表的《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一文中指出:幼子继承制度是蒙古和满洲的传统,时在1922年。尔后,旗田巍《关于建州三卫的户口》(1940)提出:女真素有父子兄弟分居的习惯,男子成年后即依序离开父亲,另居一户,财产也分别占有。

女真部落管理机构主要由大小酋长组成,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认为,吾都里部酋长是强盛家族的代表。田中通彦在《十五世纪女真族社会和初期努尔哈赤政权的构造》(载《历史人类学》第3号,1977)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吾都里部的村落内分为主体家族和从属性的依附家族,前者保持较明显的聚居,内部分化也更显著。在《明代女真族的社会构成》(载《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

年)中又表示:女真酋长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对于部民既有强制和剥削役使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这种状况与部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有关:大小酋长及其一族是奴隶的占有者,一般成员则缺少耕牛等必要的农业生产手段。

到明末努尔哈赤崛起之际,满族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从传统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逐步脱胎出新的政治组织和公共权力机构。鹭渊一、户田茂喜的《诸申的考察》、三田村泰助《穆昆塔坦制的研究》、安部健夫《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等文,依据《满文老档》卷七九至八一的《穆昆塔坦档》,对努尔哈赤的早期政权与性质分别发表了意见,尽管说解不同,成为今天研究的起点。

由牛录组合而成的八固山,又习称“八旗”,是满族进入国家时代的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日本学者历来重视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牛录是固山的基层组织,关于它的源起、建制年代、内容与性质,中山八郎《关于明末女直和八旗制度的素描》、《关于清初兵制的若干考察》

(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51年)、安部健夫《八旗满洲牛录的研究》、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之成立过程》、旗田巍《关于满洲八旗成立过程的考察》均作了专门研究,在牛录组织的氏族制起源上求得了共识:中山八郎的文章突出了牛录与哈拉穆昆的关系;旗田巍认为牛录是若干噶栅、乌克孙的结合;安部健夫强调牛录是经济组织,养兵的基体。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的认识。松浦茂

《努尔哈赤的徙民政策》是一篇独辟蹊径之作,认真考察了努尔哈赤将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诸部迁徙入旗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在八旗制度研究方面,阿南惟敬是颇有造诣的学者,论文集《清初军事史论考》(1980)重点探讨满族建国以后

八旗制度的一些专题。努尔哈赤将被征服的众多族寨编入固山牛录，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村落制度。周藤吉之《清代前期八旗村落制》（1972年）对此问题详加考察，增进了人们对八旗组织深层结构的了解。

“八王（即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体现了满族国家的重要特点，1936年，中山八郎在《关于明末女直和八旗制度的素描》中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清初努尔哈赤王国的统治机构》（载《一桥论丛》14卷2期，1944年）中利用《满文老档》作了进一步研究。以后继续探讨的有鸳渊一《清初的八固山额真》（1938年）、神田信夫《清初的贝勒》（1958年）、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等，后文是针对神田信夫考证的八和硕贝勒而写的，对其中的多铎、多尔袞提出异议。日本学者曾在《满文老档》、《朝鲜实录》等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上花费了精力，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所以在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

国内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孟森先生。孟先生著述宏富，尤于清先世事迹潜心钻研，长期致力编纂《明元清系通纪》，对有明一代女真史事梳理钩稽，193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192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篇《后金汗国之成立与发展》，叙满族兴起建国，但于政治制度的始建言之颇简。三十年代，吴晗在《朝鲜实录》中摘抄有关中国史料同时，从中录出建州女真酋长李满住事迹，撰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并就明代前期建州三卫酋长的关系加以考订，刊于1934年《燕京学报》17期（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在民国时代，满族早期历史研究尚处在低潮，直到五十年代，始趋繁荣。张维华《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1954年），王钟翰

《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度的过渡》（1956年）、莫东寅《满族史论丛》（1958年）的发表，表明国内学者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讨满族早期社会历史诸问题，在挖掘利用《满文老档》等原始资料方面，也开风气之先。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王钟翰主编《满族简史》（1979年）、《满族史研究集》（1988年）、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1册（1980年）、郑天挺《探微集》、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1981年）、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1983年）、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第9册（1986年）、李洵主编《明清史》、孙进己等5人合著《女真史》（1987年）、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1988年）、滕绍箴《满族发展史初编》（1990年）等专著专集踵相问世，将满族史、清史研究推向高潮。这些论著体例不一、详略各异，见仁见智、说解也不尽相同，对本课题研究都有不少裨益。《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是其中唯一一部关于清开国时期政治与法律制度的专史，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云：“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清入关前国家制度史的专著”。作者选择这一专题，显示出史识和勇气，他们填补空白的研究方向，足以说明其研究的学术价值。满族建国初的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大多滥觞于部落时代的传统，而是书研究起自努尔哈赤建国（1616年），由此看来，阐明满族部落制度到国家制度沿革损益的全部过程与特征，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国内学者有关满族入关前史的论文为数众多，但专门讨论早期氏族部落制度的却寥寥可数。莫东寅《明初女真族的社会形态》（载《满族史论丛》第三节），以“明初建州女真的社会组织”为专题，在分析吾都里部内部关系时，主要